

芦焚散文选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I267/103

芦焚散文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95069

江苏人民出版社



795069

封面 陈达林
扉页 张闻彩

芦焚散文选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书号: 10100·438 定价: 0.73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 目 录 •

《芦焚散文选集》序言·····	1
这世界·····	12
劳生之舟·····	15
娜拉的下落·····	19
索龙·····	25
失乐园·····	30
乡路·····	34
程耀先·····	37
关于《程耀先》·····	44
山行杂记·····	49
行脚人·····	62
老抓传·····	68
一片土·····	75
病·····	82
除夜的虹庙·····	90
河·····	94
春之歌·····	99
旧事·····	102

DP/3/69

铁匠	107
生命的灯	116
同窗	121
残烛	130
快乐的人	135
说书人	139
灯	143
邮差先生	146
哀鲁彦	148
上海手札	153
一 倦游	153
二 鲁宾逊的风	156
三 行旅	160
四 断片	164
五 上海	167
六 巢覆	170
七 插画	173
八 座谈	175
九 马食余	178
一〇 祝福	182
一一 最后的旗	187
一二 方其乐	192
一三 遗孀	198
一四 骑士	200

一五 鼯鼠	204
一六 风波	209
一七 淑女	213
一八 召顶	216
一九 住了	220
上海续札	226
一 八月十一日	226
二 副刊编辑与写稿先生	229
《落日光》题记	235
《无名氏》序言	237
《看人集》题记	241
《马兰》小引	244
《果园城记》新版后记	248
倦谈集	253
关于陀斯妥益夫斯基的	
一点感想	267
故事集	269
窥豹录	273
一 《地之子》	273
二 解《非攻》	274
致“芦焚”先生们	277
夏侯杞	280

灯下	280
座右铭	282
健全	282
纸花	284
那本老书	285
作家先生	286
卑下的人	287
投机家	288
慈善家	288
一个自私的人	289
善恶	291
镜子	292
笔录	293
醉语	294
戒言	294
笑与泪	295
苦柳	296

《芦焚散文选集》序言

芦焚是我解放前曾经使用过的笔名。我当然也使用过别的笔名，但主要是芦焚。我所以要改笔名，一九四六年七月间我写过一篇小文《致“芦焚”先生们》，这本选集里也收入了，可以参看。这里似乎还应该加几点说明。第一，诚如《致“芦焚”先生们》那封公开信中所说，我改用现在的笔名主要原因是几个人曾冒用“芦焚”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其中有涉及王任叔同志的部分，因为是次要的，非原则性的，他本人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对于他的死，我很惋惜，也很同情，所以全部删去了。第二，公开信中的“十二月八号”应该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即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租界”的日期，“我曾将（芦焚）这块招牌收起”，倒是事实；“不过等到发现你——汉奸的‘芦焚’偷去我可又夺回来，从新挂在我门口”，那只是日本人投降以后的话，其实有点近乎吹牛。不要说我并没有什么牌子，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即使有，我本人尚且躲在六尺见方的“饿夫墓”里，又如何敢挂呢！第三，我将那封公开信中的“××”改成了“特务”。我之所以认为向烽是国民党特务，主要由于给他写信的陈书薰使用的是西康保安司令部的信封，大概也就在西康保安司令部做事，而在保安司令部做事的大多数是特务。还有一个使我怀疑向烽是特务的原因，那是后来的事。有个在“肃反”时曾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法办的国民党特务，解放后亲自告诉过我，他在四川一个什么中学里曾和向烽同事，并规劝过他勿冒用“芦焚”笔名发表文章，他不听劝告。这里似乎还需要把我跟那个被法办的国民党特务的关系交代一笔。

原来我一九三六年夏秋之间从北平来上海，经过河南住在开封一家旅馆里。有一天，一位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共产党朋友到旅馆里来看我，带着他的一个同学。那位朋友坐了一会，推托有事先走了。我也以为他真的有事。不料等他那个同学走后，又神情紧张的匆匆赶回来，说他的同学是国民党，得知我住的旅馆，硬逼着他来介绍。他不敢得罪他，只好冒昧带着来了，并警告我要“注意”这个人。在大学里读书而要参加国民党，我那位朋友又那样“怕”他，可见并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解放后，我不知道这个人也在上海。我在上海出版公司任总编辑，一九五一年他到公司里来找我，说是抗战期间一直在四川，解放前曾在四川省党部任职，因办文艺刊物，发表进步文章，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现在在上海一个中学校教书，写了很多抗美援朝诗歌，愿意自费印刷，托我找一家替他“出版”的书店。他不知道自费印刷、托书店出版是解放以前的事，解放后任何书店都不肯干了。他竭力冒充“进步”，曾经到公司找过我好几次。他告诉我曾和向烽同事，并规劝向烽勿冒用“芦焚”作笔名，究竟是哪一次，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

当然，光凭一封可能是特务的人写给他的信，他曾和特务同事，就判定这个人也是特务，难免失之武断。现在实行法治，讲究实事求是，不能象国民党统治时期，更不能象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统治时期，可以任意加之以罪，陷人于死。那就在特务上面给他加上“可能是”三个字吧。

自从我那篇《致“芦焚”先生们》发表后，一位在香港的朋友曾寄给我一份当地报纸的剪报，上面说：胜利以后，有人冒充芦焚，在某地火车站——可能就是上海火车站，勾引上一个青年妇女，并蹂躏了她。这份剪报我本来一直保存着，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抄家抄去，直到今天还没有发还我，虽然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奉“四人帮”之命，彻底清理整四年了。我无从断定这个流氓“芦焚”是汉奸的“芦焚”，还是“可能是”特务的“芦焚”，或者是另外的“芦

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很复杂的。例如国民党会和汉奸勾结，那份剪报文章仿佛不曾写下他的真实姓名。其实即使写下真实姓名，若非向烽，我也无从断定是哪个“芦焚”。

话还得说回去。约在日本人占领“租界”后的一九四二年，我发现汉奸的“芦焚”在汪记《中华日报》发表文章，记得我曾在一家与汪伪没有关系的小报上登过声明。最近据上海文学研究所的洪荒同志函告：他们研究“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学，曾在《大美晚报》上发现同样的声明。他不知道我需要这个声明，当时不曾抄下来。我也没有工夫去查那份报纸。前几天为着编短篇小说和散文选集，去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翻期刊，偶然发现我致《万象》编者的一封信，刊登在我的短篇小说《狩猎》后面，现在抄录在这里吧。

柯灵兄 尊示奉悉。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你没有想到。接办刊物的困难是意中事，你要稿子，在情义上既不能拒绝，而我却远在前年年底就收拾起来，决心不再发表什么了。一时不想动笔。旧稿倒积存了几篇，惟用时须将题目制版，因为就我所知，从去年起便有另一位“芦焚”在上海发表文章，此其所谓以别大雅也。又，今后凡作品以贱名刊出，题目未经制版或制版而字迹不符者，倘非转载，则即为另一“芦焚”所为，与弟无涉。如果方便，祈将此信掲登贵志，聊作声明。专此布达。顺颂
清吉

芦焚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里的“三十二年”是中华民国纪年，即公历的一九四三年。那我为什么把这个早已送人的笔名，隔了三十多年，又收回来使用呢？理由有二。其一，我认为发表文章要署名，表示作者须负责任，写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许赖账拆烂污。这些文章的绝大多数是用芦焚笔名发表的，芦焚即今天的师陀要负责任。其二，

从我发表《致“芦焚”先生们》以后三十多年过去了，似乎在国内还没有人冒用过“芦焚”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尽管有人冒用过“芦焚”的名义欺骗过妇女，可能还用“芦焚”的名义做过其他坏事，而我又没有办法替这些冒牌货的“芦焚”负责。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决定这个选集仍旧用芦焚作笔名，名正言顺。

我是反对修改少作的，过去我修改过，例如《果园城记》，然而也只限于字句和意义欠明确的地方。我曾当面请教过巴金、沙汀、艾芜同志，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作家，都是我的前辈。我尊敬的作家和前辈，当然还有很多，只是没有机会去看他们，当面向他们请教。写信去呢，这些人大都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有的且八十多岁了，例如茅公、叶老等，他们仍在勤勤恳恳写作，把经验传给后辈；要么正给后辈留下创作的典范，例如丁玲、周而复、欧阳山同志等，我不忍打搅他们。沙汀同志的意见我在《关于〈程耀先〉》一文中讲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巴金同志建议我修改，只是别把现在的思想加进去。艾芜同志也建议当时写的不准确的地方要修改，并现身说法，举他自己的一篇作品的结尾为例。对于他们几位的意见我虚心接受。这不但因为他们的成就比我高得多，对读者所起的积极教育作用比我大得多，还因为他们都是大作家，他们从第一篇作品起就创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没有自己的风格。很想建立自己的风格，摸索了五十年，直到今天不曾摸索出来。我的不改少作，第一，意在使今天的青年作家和读者知道我走过的路程，一种艰苦的而不是失败的路程。第二，意在鼓励今天的青年作家。刚解放时我只有三十九岁多点，还勉强算得上青年，使今天的青年作家看看自己的写作水平比昨天的青年作家我的写作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使他们有信心，有勇气，努力写作，写出更多的作品。第三点和我的不改少作没有关系，也许会使读者和青年作家增加点旧社会的知识，虽然我对旧社会的知识并不多，我毕竟在旧社会生活过，比一般解放后出生的青年多一点。知道过去才

知道现在，知道现在才知道将来。我想这是对今天的青年人和少数忘了本的老年人都是大有益处的。

由于上述第一、第二种原因，由于这本散文选集包括散文、序言、杂文、散文诗，我采用了分类编年体。其中有须加以说明的地方。我本来留着一个账单，上面记着每篇稿子写成的日期，发表的报刊名称和时间。这个账单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抄家抄去，没有发还给我。因此，有几篇没有写成日期的，现在只好做约略的估计。例如收在散文集《黄花苔》中的《这世界》、《劳生之舟》、《娜拉的下落》、《失乐园》、《乡路》，有的是根据文字的叙述和我的经历推算出来，如《失乐园》、《乡路》，剩下的只能根据《黄花苔》中没有收入《程耀先》来估计了。《程耀先》写成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写成它们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三一年与一九三五年二月之间。这些东西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查报纸。刊物查起来比较方便，如《劳生之舟》发表于《文学季刊》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后面竟没有写成的日期。那么，无论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凡收入集子后面注明日期的，大多数是根据那份被抄家抄去的账单的。

散文部分还有几篇须加解释，今天的读者才能更清楚的了解它们的意义。《行脚人》是写一个共产党员，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不便公开写明，只好称为“调查家”。这位“调查家”在深山里研究人民生活，看地形，准备打游击。《老抓传》原来的题目是《巨人》，原题目有些夸大，倒是真人真事。农民在旧社会也有人恋爱，绝大多数又以失败告终，老抓的悲剧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一片土》是旧社会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的人格化，采取寓言形式，他们自命“高雅”，其实毫无能力，除了害人，只会给世界留下一股青烟。这篇小文仅揭露自命“高雅”的人的一面。他们还有另一面，一百个人中有一百个全要往上爬，绝无例外。约在一九三八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消灭了占领海盐县城的日伪军，国民党政府通

过“曲线救国”的“忠义救国军”开了进去，诬蔑共产党是汉奸，杀害游击队领导人和一部分群众。后来日寇报复，他们便逃到上海，在南市开赌场。我为了发泄愤怒，通过两个虚构的人物，写成《残烛》。

《上海手札》原来有十八篇，它们写成的时间以及写成的经过，一九四一年我曾在初版后记里讲到过，现在为省事起见，剪贴在下面。

这些所谓《手札》的一至十三写成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到九月初，十六至十八写成于一九四〇年六月下旬，中间两篇写成的时日目前已记不得，想来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年底。当初写它们的目的是为着驱除瞌睡，时间多半都在下午，因为吃过午饭就昏昏然感到想睡，睡下去又怕晚上失眠，不得不为自己找一点事作。这时候作正经事自然做不成，我只好勉强瞎写，结果就是现在的这本小书。

当初我并没有想能得到这种结果，写的时候没有一定计划，没有认真搜集材料，只是想起来便下手。文章为着避免瞌睡而写，而又居然成书，讲起来不大象话。倘使名为《却睡录》，我想或者更合适些，同时其为劣作自然不想也可知了。

我不想掩饰我的厌倦，校样在我手边放了两天，我毫没有要看它们的意思。一个观念苦恼着我，我为什么不写一些美丽的，于人是一种安慰，于自己是一种快乐的东西？

“它不会伤害它的读者吗？”我屡次这样自问。

在这里我想起契诃夫——这个人我相信对于丑恶比他的同时代的作家更少爱好——我希望将来我有机会讲到这一点：我不是指作品给予人类的影响方面，而是指

个人的精神，在跟契诃夫同时生活过的作家中，不管是屠格涅夫，不管是托尔斯泰，也不管是高尔基，他们都有一个不能跟他比拟的地方；在另一方面，他自然也有不能跟他们比拟的地方。

不过我首先必须声明：我不过是随便在这里提起一笔，我并不想用我这种东西侮辱我敬爱的古人。在结束这篇跋文之前我想起我们乡下有一句俗话，人们说：

“好花插在牛粪上了！”

这意思大概是指一个好女子嫁给一个丑陋丈夫。然而就实在情形讲，我们都知道好花需要肥料。在这里我愿意把这小书当作牛粪；倘使连这也不配，则可以做引玉的砖石。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记

这本书我保存两本，都是初版本，一本大概是出版社照例送给作者二三十本的残留，还有一本是我从旧书店买来的。两本的目录中都印着：“一一 删去一篇 六九——七八”，“一一”是十八篇排列的次序，即第十一篇；“删去一篇”代替原来的题目；“六九——七八”则是原文的页码。那么按当时的情形看，这被删去一篇的是与抗日有关的文章了。出版者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虽然在“公共租界”，编辑部和栈房在“法租界”，也正和同是在“公共租界”而被迫停刊的《文汇报》一样，日本鬼子的魔手已伸入“租界”，“租界”当局不敢得罪他们，大约由于出版社害怕被“查封”，把本来印好的临时抽去了。然而文化生活出版社终于不曾逃脱悲惨可怕的命运，后来日本鬼子占领“租界”，出版社被查封，出版社留驻上海的负责人陆蠡至今下落不明。这是后话。这篇被删去的稿子想来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发表在上海或内地，发表的报刊名称，早已全部忘记。我是保存着校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也被抄家抄去，没有发还给我，现在是连题目也记不起来了。因此我决定把这“删

去一篇”仍旧保留在目录里，作为纪念。

意外的是我“作为纪念”的心愿没有实现。这里需要加一点补充。由于我的住房狭小，书只好成捆的堆起来，写字台上更是乱七八糟。这本散文选集前几天已经基本完工，我将过去收入集子里的东西一篇一篇拆下来，不料两个钟头后我发现地板上有一篇文章的头一页，后面的几页翻遍全台子，找来找去竟渺若黄鹤。那本书我只有一本。无法子可想，只好向巴金借抄。他答应找找看。两天后他写信来，说是找到了。我打电话问他几时去拿。其实我根本用不着打电话，他兼的职务虽然很多，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为着写作，非必要的会议或应酬，他一律推掉，平常基本都在家里。当然他也深怕家里人担心。记得两年前我去看他，每一次他都坚持送我到电车站；假使我不乘电车，他坚持步行送我，走的路更远，毛估估将近二里，也许超过两里。现在是如果没有他女儿李小林陪着，他根本不出门了。也就是在这次电话上，他说《上海手札》的十八篇全文俱在，并骂我“糊里糊涂”。原来我编选集中间，发现自己保存的书中有几篇残缺，曾借来他保存的抄过，并带着这“删去一篇”的《上海手札》给他看过。这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他的记忆力很好，也很细心，大概在找我向他借的那本书时，想起来我给他看过的《上海手札》，找出自己保存的一本翻翻，果然十八篇俱在，“删去一篇”是《最后的旗》。同是一本书，又同是初出，为什么会两样呢？而且出版社送给作者的书也是“删去一篇”的呢？一九四一年上海早已成为“孤岛”，上海印的书运到内地去发行显然不可能。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因为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虽然当时本人远在内地，出版社特意为他保留一本或寄给他一本。他不同意我的猜测。他对自己不能确定的事情总是存疑。

死守四行仓库的是掩护“国军”撤退的谢晋元团，当时出尽了风头，后来吃尽了苦头，据说日本投降后，谢晋元本人连路都不

会走了，可谓对国民党忠心耿耿。可是他的命运似乎不大好，至少没有汪伪政权的行政院院长周佛海之流好，也没有“曲线救国”的工具冯治安之流好，他们在日本统治时期对国家人民犯下弥天大罪，日本投降，一个个都被“招安”，做了司令、总指挥、“绥靖公署”副主任，他——谢晋元却白白做了牺牲品。

另外我加进去一篇《方其乐》。这不但由于它的性质和《上海手札》相同，写成的时间相同，还由于里边有几个地方提到过他。

隔了好几年之后，我又写《上海续札》，只写了两篇。两篇都是记事。日本人投降，正如《八月十一日》一文中所讲，我跟大多数吃了八年苦的上海人同样兴奋，准备写一本歌颂民主与建设的书。可是只经过短短的一个星期，我的感情从幻想的美丽云端便跌入无底的深渊，心中充满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愤恨和憎恶。《副刊编辑与写稿先生》是在被逼迫的情形下写出来的，其实这本“续札”早已写不下去了。当时有人说我是“明哲保身”，颇具讽刺意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缺乏政治涵养，不善于作政治斗争；否则我可以留下群丑的画像：天上来的和地下钻出来的“劫收界”；横行的特务；明明是大汉奸，竟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军”的总指挥；甚至一个小兵都会打上海人的耳光，并骂他“亡国奴”，他自己很可能昨天还是汉奸兵呵！……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出来，即使有那位副刊编辑敢“挺”也不可能。解放后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如果把原稿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会被抄家抄去，给我毁掉。写到这里，我感到当时自己不曾写下去，倒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杂文中的《〈地之子〉》和《解〈非攻〉》是我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时的介绍词。我担任这个工作是应李德伦同志之约。德伦当时和他妹妹李频同志在“苦干剧团”作演员，同时兼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艺节目的工作，他又在一家什么音乐学院学拉大提琴。他妹妹任广播员，他本人则是文艺节目的“总督”。由于苏联和日本签有《互不侵犯协定》，所以日本占领“租界”后，仍旧允许

苏联设领事馆，办时代出版社，建立广播电台。出版社当时编印两个刊物：《时代》和《苏联文学》，似乎还印过许多单行本文艺书籍。《时代》是周刊，专门报道卫国战争的前线消息；《苏联文学》是月刊，专门登载反映卫国战争的文艺作品。苏联在上海办广播电台，无疑为的是报道消息更及时，更广泛，使每一户有收音机的人家都能听到。但是一个广播电台不能只报道打仗，需要有别的节目配合，才能吸引听众，就技巧而言，才能达到掩护主要目的的目的。因此我“上任”之初，我们的“总督”就按照电台负责人的意见关照我：要选“灰色”的作品，“红色”的不行，“淡红色”的也不行。等因奉此，我于是每周选两篇“灰色”作品，连自己写的介绍词，一并交给播音员李频同志，那时大家管她叫“德伦妹”的。我前后在苏联上海广播电台任文学编辑六七年，合计起来，总共写的介绍词有几百篇。这两篇介绍词虽然用佩芳笔名发表在抗战胜利以后，回想起来，我写它们的时间要早得多。因为抗战胜利以后，苏联不再怕日本人封闭电台，我也就放心大胆，开始介绍丁玲同志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夏衍同志逃离香港，经过东江游击区的记事、八路军根据地的其他作品了。《地之子》我选的似乎不止一篇，凡是不超过电台规定的三十分钟的我都选过，我认为好的作品，即使超过三十分钟，也分作两次广播。鲁迅先生的晚年，国家的命运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三省。他的《非攻》自然是根据当时的现状写成的，与其说是反侵略，倒不如说是一篇救亡历史小说。事实上当时全国都知道侵略宋国——也就是中国的是什么人，我只讲历史背景，不另外加什么说明，让听众从原作中去体会。讽刺买办思想的《那本老书》是用韩孤笔名发表。

《夏后杞》用康了斋这个笔名，最初陆续发表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就我的记忆讲，《世纪风》的编辑约我写稿是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文汇报》被勒令停刊，其中的大多数应